

亨克《王阳明哲学》及其中文底本

《阳明先生集要》考述

王宇¹

【摘要】 美国学者亨克的《王阳明哲学》是英语世界最早的王阳明作品选集,长期以来影响巨大。但是亨克并未交代自己所翻译的中文底本为何书,直到 1964 年,倪德卫才考证出亨克翻译的是明末余姚人施邦曜辑评的《阳明先生集要》,但此书在清末民国初年版本很多。本文对比了《阳明先生集要》的各种版本,最后考证出亨克所翻译的是上海明明学社铅印的《学部校正阳明先生集要》;通过与中文底本的比较,可以发现亨克《王阳明哲学》的优点和不足。

【关键词】 王阳明 亨克 英译本

1916 年,美国学者亨克出版了他翻译编辑的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London: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下文简称“英文本”),作为英语世界第一部王阳明作品选集,它的出版无疑对王阳明的海外传播有椎轮作始之功。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亨克所翻译的是哪一种王阳明作品集并未关注,直到 1964 年,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发表了关于陈荣捷的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nvins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 和亨克此书的书评,⁽¹⁾第一次对亨克所译中文底本进行了考察,指出亨克所翻译的是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版本是商务印书馆 1922—1922 年间出版的《四部丛刊初编本》影印崇祯刻本,Nivison 比较了这个刻本与亨克译本中所标注的中文底本页码,认为“几乎完全一致”(The pagination of this edition is almost the same with Henke's)。他还正确地指出,亨克并不知道自己翻译的中文底本是《阳明先生集要》。

(2)

Nivson 教授的发现非常重要,《阳明先生集要》确实是 Henke 翻译的中文底本,但他的结论仍存在缺憾。因为《阳明先生集要》版本众多,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固然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但通过对施邦曜《阳明先生集要》的成书过程、版本源流以及该书在清末民初的流传情况进行考证,再结合亨克在《王阳明哲学》一书中提供的线索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亨克所翻译的《阳明先生集要》是上海明明学社在 1907—1911 年间出版的铅字本《学部校正阳明先生集要三种》(下文简称“明明学社本”),而不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

下面,本文将对《王阳明哲学》与《阳明先生集要》进行初步比较,再对《阳明先生集要》的成书过程、版本情况进行考察,然后论证明明学社铅印本才是亨克所译中文底本,最后以中文底本的角度对亨克的编译工作的得失略加点评。

一、亨克《王阳明哲学》和《阳明先生集要》的初步比较

亨克(Frederick G. Henke),1876 年生于美国的爱荷华州。1900 年,他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在南昌传教,1907 年,亨克回到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读了博士。1910 年,他受邀担任金陵大学哲学和心理学教授。1911 年,应上海的英国皇家学会华北分会的邀请,他对王阳明进行了广泛的研究。1912 年秋,亨克在英国皇家学会华北分会宣读了他的初步研究成果——《王阳明生平和哲

¹作者简介:王宇,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杭州 310007)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09)阶段性成果、浙江省社科院“中国哲学史”重点学科成果。

学研究》，此文发表于 1913 年出版的该会会刊上。1914 年，亨克又在《一元论》杂志发表了论文《王阳明：一个中国的观念论者》。1916 年，亨克正式出版了他多年研究王阳明的成果《王阳明哲学》。⁽³⁾亨克在该书《译者序》中简要介绍了王阳明的思想观点，并评价了他的历史地位。全书正文 512 页，包括了《年谱》和著作摘译两部分。

著作摘译又分为四编：第一编(Book I)全部出自《传习录》，为《王文成公全书》本《传习录》卷一和卷二；第二编(Book II)由“《语录》”和《大学问》两部分组成，系《王文成公全书》本《传习录》卷三中的王阳明语录，以及《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第三编(Book III)题为“王阳明书信”，收入王阳明书信 12 篇；第四编(Book IV)题为“王阳明的书信(续)”，收入王阳明作品 50 篇。下面将《王阳明哲学》与《阳明先生集要》进行简单的比较(参见表 1)。

可以看出，《王阳明哲学》与《阳明先生集要》结构基本一致。不过，Book IV(《集要理学编》卷四)所收 50 篇文章中，只有 38 篇为书信，余下 12 篇是序跋，亨克将其命名为“王阳明书信(续)”，显然不准确。

二、《阳明先生集要》成书过程及其在清末的流传情况

施邦曜(1585—1644)，字尔韬，号四明，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人，官至左副都御史，明亡时在北京自尽殉国，南明政权赐谥忠介，赠太子少保、左都御史，清朝赐谥忠愍。⁽⁴⁾施邦曜一生服膺阳明学，著述甚丰，《阳明先生集要》是他的代表作。⁽⁵⁾天启七年(1626 年)，施邦曜由工部屯田司郎中放漳州知府，数年后升福建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汀漳道，仍驻漳州，⁽⁶⁾故崇祯八年刻本中吏员王立準跋称施邦曜为“道台施公”。⁽⁷⁾此后升福建布政司左参政，崇祯十年(1637 年)升四川按察使、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崇祯十一年任南京光禄寺少卿。⁽⁸⁾

崇祯八年，王立準在漳州平和县刊刻此书，全书分成《年谱》一卷，《理学编》三卷、《经济编》七卷(介绍阳明的事业成就)、《文章编》四卷(介绍阳明的文学成就)。这其中，《年谱》是施邦曜自己编辑的，刘原道认为此谱是在李贽年谱基础上增删而成：“按阳明先生年谱之作，昉自明温陵李卓吾贄，析为上下两卷，稍失烦碎。嗣后刊先生集者，必补录年谱于卷首，大率以温陵为先河，惟互有增损，莫衷一是。兹刻参校诸本，却者补之，讹者正之，务期详确而无凌杂，俾学者先得综观先生之生平而后循其年而读其书。”⁽⁹⁾刘氏这段识语首见于 1906 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铅印本《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年谱》之后，1907 年明明学社铅印本《阳明先生集要三种》也收入了这篇识语，可见刘氏并非这两个版本《阳明先生集要》年谱的编者。⁽¹⁰⁾

表 1 《王阳明哲学》与《阳明先生集要》结构对照表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阳明先生集要	
The Biography of Wang Yang-ming		年谱	
Book I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fe (Part I)	理学编 卷一	传习录一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fe (Part II)		传习录二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fe (Part III)		传习录三
Book II	Record of Discourses	理学编 卷二	语录
	Inquiry REGARDING THE GREAT LEARNING		大学问
Book III Letters Written by Wang Yang-ming	Answer to Wang Tlen-Yii ……(以下 11 篇题名略)	理学编 卷三	答王天宇 …… (以下 11 篇题名略)

Book IV Letters Written by Wang Y ang-ming (Contiued)	Letter to the Students an Ch' engchung (以下 49 篇题名略)	理学编 卷四	与辰中诸生 (以下 49 篇题名略)
---	--	-----------	--------------------------------

《阳明先生集要》流传于世的版本主要由崇祯本和乾隆本两个系统构成。

(1) 崇祯本。施邦曜在福建省漳州府任职时,于明思宗崇祯八年所刻版本,也是此书的初刻本。此本卷首有林鈇、王志道、黄道周、颜继祖、施邦曜五人序,书末有王立準两篇跋。1919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借印无锡孙氏小绿天藏明崇祯间施邦曜刊本,《四部丛刊初编集部》所收录的,即是此本。

(2) 乾隆本。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由于崇祯本刻本久已残灭,余姚朱培行、徐坤根据张廷枚搜集到的五个崇祯本,⁽¹¹⁾重加校勘后刊刻,是为乾隆本。与崇祯本相比,乾隆本增加了徐坤、黄璋、张廷枚三位清人的序文,还增加了曹惟才、王命璿二人的序,其中曹序撰于“甲戌(崇祯七年)秋八月”,此时崇祯本刚刚开始刻板;⁽¹²⁾王序中提到:“幸我四明施公抚漳,前后十年于兹。”则王序撰于崇祯十年,即崇祯本付刻两年之后。涵芬楼影印之崇祯本并无王命璿序,可见为崇祯八年初刻本,但王命璿序必然出自张廷枚搜集到的五个崇祯本之中,故崇祯十年另有一重刻本。

(3) 黔南本及其翻刻本。乾隆本问世后,其板片在嘉庆年间毁于火,咸丰年间太平军攻占余姚,刻板全部损坏。光绪五年(1879 年),林肇元根据隆庆刻本在贵阳重刻了《阳明先生集要》,即所谓黔南本,是本除全录崇祯本、乾隆本诸家序跋外,又增加了林肇元序。黔南本面世后,流行很广,多次翻印重刻。孙锵于 1914 年写道:“近世湖南有《全集》本,浙江有《全书》本,若江南制造局本,则由黔本翻出,而上海明明学社、成都文伦书局,又从制造局本翻印,皆所谓《集要三种》本。”⁽¹³⁾孙锵所谓“黔本”即黔南本,他指出“明明学社本”是从“制造局本”翻印而来的。限于条件,笔者未能见到江南制造局本,但考察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所藏乾隆本、黔南本和宣统三年(1911 年)二月出版的明明学社铅印本《学部校正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并进行了比较,可证孙锵所说不误。

(4) 明明学社铅印本。明明学社铅印本装成四册,版框(高×宽)17.0×13.1cm,开本(高×宽)22.1×15.1cm,半页 13 行,每行 29 字,白口四周双边,有朱色圈点和圆圈断句,末尾有方硕辅《后序》、⁽¹⁴⁾葛钟秀 1907 年(丁未)夏《跋》。方硕辅时任上海江南制造局会办、总办,他根据举人张咏霓(鄞县人)所赠“原刻本”,“借局铅浇板”,于 1906 出版,铅板存上海江南制造局,正式出版时方氏已经离开上海。方氏《后序》未明言所谓“原刻本”是哪个版本,但明明学社本中收录了只有黔南本才有的林肇元《三刻阳明先生集要序》,可推知并非乾隆本,而是黔南本。葛钟秀《阳明先生集要三种跋》称,他于 1906 年在上海得到候补知县刘原道(号笠僧)所赠江南制造局本,⁽¹⁵⁾“批阅集中有错脱约百字,用朱笔改补,”刘原道遂据葛钟秀校改处“剞易”制造局铅字板,“适明明学社主人以是集维世教,谋缩印小板,价较廉,便人购取以广传也。”由于并未直接取用江南制造局铅板印刷,而吸收了葛氏的校勘成果重新浇铅印刷,故明明学社的版本尺寸比制造局本略小。与黔南本相比,明明学社铅印本保留了崇祯本、乾隆本、黔南本各家序跋,又在书前郑孝胥、马良、严复、方硕辅(前序)四篇序,从郑、马、严三序内容看,都是应方硕辅之邀所撰,故此四序为江南制造局本所增。⁽¹⁶⁾明明学社在编辑时,又在第一册正文前增加了下列内容:一是署名“明明学社藏版”的《会稽阳明洞真景》以及明明学社主人所撰《识语》;二是《王阳明先生真像》以及自公堂主人俞麟的识语和 1906 年(“光绪丙午”)刘原道的识语。在正文部分,明明学社本《年谱》末尾增加了刘原道跋语,全书第四册末尾增加了方硕辅的《古本大学注》。上述内容都是明明学社特有而他本所无的。明明学社自 1907 年第一次印刷,⁽¹⁷⁾而浙江图书馆藏 1911 年二月本版权页显示已是“三版”,其二版时间尚不可考,本文上文已指出,亨克是从 1911 年开始着手王阳明研究的,⁽¹⁸⁾故购到 1907 年至 1911 年三月间的任何一版的可能性都存在。

除此之外,中华书局于 2008 年出版了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的《阳明先生集要》,此本以《四部丛刊初编》影印之崇祯本为底本,以黔南本为参校本,本文简称“点校本”。

三、明明学社铅印本是亨克翻译的中文底本

那么,为什么亨克的中文底本是明明学社本《阳明先生集要》,而不是崇祯本、乾隆本、黔南本或江南制造局本呢?理由如下。

1. 亨克对中文底本责任人的称呼证明是乾隆本系统而非崇祯本

亨克在《译者序》中说,他所选录的王阳明作品的版本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四册装的王阳明著作集(four volume edition of Wang 's works)”,⁽¹⁹⁾未提到任何著作者信息。但在第一编《传习录》第一部分(Part I)标题处,亨克有一注释:“There werer ecorded by Ts' u Ai, arranged by Shih Ssu-ming, and later revised by Ts' uK' un and ChuP' ei-hsing.”⁽²⁰⁾这里提到的四个人名是确认亨克中文底本的最重要线索。其中 Ts' uAi,即《传习录》卷一的记录者、阳明弟子徐爱,“Shih Ssu-ming”则是施邦曜的号“施四明”,Chu P' ei-hsing 就是乾隆本刊刻者朱培行,而 Ts' uK' un 即乾隆刻本的发起人和撰序者之一——余姚人徐坤。但是,乾隆本撰序人还有黄璋、张廷枚,何以亨克仅提及徐坤呢?笔者核对了浙江图书馆所藏乾隆本、黔南本、明明学社铅印本,三个版本的各卷卷首题名都是:“施四明先生评辑、邑后学徐坤师厚、朱培行仲稿谨校。”⁽²¹⁾而崇祯本各卷卷首题名是“同邑后学施邦曜重编、江右后学曾樱参订”,亨克或其中国助手看到的只能是乾隆五十二年本或其翻刻本,而不是崇祯本。⁽²²⁾亨克受这一卷首题名的影响,认为“施四明”(Shih Ssu-ming)、徐坤、朱培行是该书最重要的责任人,而且卷首只以别号称呼施邦曜,下面徐、朱二人则名、字俱全,遂给亨克或其中国助手造成错觉,认为“施四明”就是其名。总之,亨克的中文底本属乾隆本系统或黔南本的翻刻本,而非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的崇祯本。

2. 上海商务印书馆是亨克所称中文底本的发行者而非出版者

《四部丛刊初编》陆续出版于 1919—1922 年,《王阳明哲学》出版于 1916 年,亨克不可能看到此本。再考《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²³⁾该社在 1916 年之前从未出版过《阳明先生集要》,但是亨克在《译者序》中称他的中文底本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distribut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of Shanghai)。⁽²⁴⁾而明明学社宣统三年(1911 年)版铅印本版权页详细开列付印、责任人、销售机构:“付印兼发行者:明明学社”;“校勘者:葛钟秀”;“印刷者上海爱文义路中新书局”;以及 4 个“经售处”,分别是:“上海棋盘街本外埠中国图书公司、上海四马路本外埠商务印书馆、上海望平街时中书局、⁽²⁵⁾上海四马路群学社”,亨克当时在南京的金陵大学,他或他的中国助手通过上海商务印书馆购到了明明学社本《阳明先生集要》,就误认为商务印书馆是此书的出版机构。可见亨克所见《阳明先生集要》虽由商务印书馆发售,但非商务印书馆出版。

那么,亨克有没有可能从商务印书馆买到了乾隆本系统的黔南本或江南制造局本呢?明明学社《阳明先生集要三种》的版权页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因为,亨克指出中文底本是 4 册装,乾隆本装订成 15 册,黔南本为 16 册、江南制造局本为 12 册,与亨克所述 4 册装订不符,只有明明学社铅印本恰为 4 册装,该书版权页也说:“《阳明集要三种》每部四册。”

3. 亨克所标中文底本页码与明明学社本页码完全吻合

正如倪德卫教授指出的那样,亨克在《王阳明哲学》正文中用双括号标明了中文底本's 页码,其页码与《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崇祯本有一定的出入。由于明明学社本是每卷计算页码,笔者对照了各卷的起迄页码,崇祯本《年谱》共二十五叶,而亨克标注的页码结束于 28 页,明明学社本《年谱》也结束于 28 页,卷一《传习录一》崇祯本合计十五叶,明明学社铅印本与亨克都标注到第 17 页;卷一《传习录二》,明明学社铅印本与亨克都结束于第 38 页,崇祯本则为三十叶,卷一《传习录三》亨克标到第 57 页,明明学社本标至第 58 页,因为明明学社本的第 58 页只有“右门人薛侃录”中“侃录”两个字,不能独立成句,故亨克不另计页码。总之,亨克所标页码与崇祯本不同,而与明明学社铅印本一致。

除了以上三点之外,《王阳明哲学》的封面以及第三编(BookIII)卷首有《王阳明先生遗像》一幅,崇祯本、乾隆本、黔南本均无此像,仅明明学社本卷首刊有《王阳明先生遗像》,正与《王阳明哲学》所刊为同一画像。以上证据都证明,亨克所译的中文

底本即是明明学社铅印本。

三、亨克对《阳明先生集要》的改编

亨克除将《阳明先生集要》正文内容翻译为英文外,还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改编,一是撰写了内容提要,二是删节了部分施邦曜评语。

1. 亨克撰写的内容提要

为了帮助读者方便地理解阳明思想,亨克在正文中撰写了大量内容提要,其篇幅只是短短的一句话,是否准确切题也见仁见智,但无疑大大方便了西方读者阅读。

卷一、卷二的语录部分,原书目录已经注明了各部分的语录条数,即卷一的《传习录一》共十六条,《传习录二》共六十七条,《传习录三》共三十五条,卷二《语录》共六十条。原书的正文中,每条语录一段到底。但是有些条目很长,人物问答非常复杂,有些条目则很短,卷一《传习录二》最短的一条只有一句话:“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²⁶⁾长的条目将近千字。无论各条字数多寡,原书每条都一段到底,下一条另起一行顶格。亨克考虑到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先为整个条目撰写了提要,并将篇幅较长、问答回合较多的条目由一整段分解成若干自然段。卷三、卷四属于书信、序跋等单篇文字,原书都已有题目,亨克显然觉得原文还是太长,故将原文一篇分成若干大段,每大段相应撰写提要,每大段下再分成若干自然段,这样处理使得文本结构更加清晰,既方便了阅读,又突出了王阳明的重要言论,还保留了原书的条目构成。相比之下,中华书局2008年点校本虽然在目录中明载了卷一、卷二各部分语录条目的数量,但正文中条目与条目之间仅空出一行,以示区别,而篇幅较长、字数较多的语录条目又分成若干自然段(每自然段低两格另起一行),造成文本层次不清,读者容易混淆,其实对照亨克的做法,虽不必逐条撰写提要,也应该逐条以数字编号,以清眉目。

2. 删节施邦曜评语

《阳明先生集要》是施邦曜编辑、评注王阳明作品的选集,书中有大量施邦曜的评语,这些评语又可以分成眉批和评注两种形式。所谓眉批即出现在正文页天头的批语,所谓评注则出现在王阳明作品的末尾。施邦曜的眉批分布在《理学编》全部四卷之中。但文末评注的分布情况比较复杂,《理学编》卷一完全没有评注,卷二分成《语录》和《大学问》两部分,两部分的末尾施氏各有一条较长的评注,卷三和卷四都是单篇文章,施氏几乎在每篇结尾都有评注。

亨克删去了全部施邦曜的天头眉批,文末评注则全部翻译成了英文,并在评注文字前以斜体字“comments—”标明下列内容属于评语,使读者不致混淆。

尽管如此,亨克仍留下一个缺憾:他并不知道这些评语的作者正是他在第47页注释中提到的施邦曜(“施四明”)。因此大多数“comments—”部分没有注明是谁注释的,只是在《大学问》部分末尾的评语中,亨克注释道:“就此,徐爱进行了评论。”⁽²⁷⁾可能他认为所有的评语都出自徐爱。其实中文底本卷二《语录》部分的评注结束时注明了“邦曜识”,⁽²⁸⁾评语中还称呼王阳明为“文成”,亨克对这个词特别加注,指出“文成”是王阳明的“posthumous title”(谥号),⁽²⁹⁾而徐爱早于阳明去世,不可能用谥号称呼阳明,然而这些迹象都未引起亨克的注意,而且,亨克在此处没有用“comments—”标明此处评语,遂与正文混为一体。

四、对亨克工作的评价

首先要指出的是,《阳明先生集要》是一部层次繁复、体裁多样、结构非常复杂的大部头著作,书中既有阳明自撰的文章,又有弟子记录的阳明语录,又有两种类型的施邦曜评语。在英语世界对王阳明所知甚少的1910年代,亨克能够将全部正文和部分施

邦曜评语翻译英文,需要非凡的热情、勇气和耐心,《王阳明哲学》的面世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毋庸讳言,由于中文水平所限和文化隔阂,《王阳明哲学》在处理中文底本时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准确完整地表述他所翻译的中文底本的名称责任人和出版发行信息,而这些信息在明明学术铅印本的版权页中都标识得非常清晰,如果亨克认真研究过版权页和序跋,就不会写不出中文底本的书名;第二,由于不知道中文底本是施邦曜辑评本,亨克始终没有弄清楚中文底本中的“comments”是谁写的;第三,亨克在目录中也犯了一个小错误,Book IV中既有书信也有序跋,但亨克为 Book IV所拟的标题却是“Letters Written by Wang Yang-ming”。

这些失误令人产生这样一种联想,亨克似乎受到了其中国助手或友人的误导,这种误导可能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后者也没有正确解读这些信息。亨克在《译者序》中说,他的翻译工作得到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帮助:其中一位老式(old school)中国学者为他解释疑难的句子,三位金陵大学教师分工审阅了四卷书稿,并提出了意见:Professor Liu Ching-fu 审读《年谱》和卷三,Professor Alexander Y. Lee 审读了卷一和卷二,Professor Liu Ching-pan 审读了卷四。⁽³⁰⁾这三个名字中,只有 Liu Ching-fu 可考是刘敬甫,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1926 年时仍在金陵大学教育系任教。⁽³¹⁾亨克在《译者序》中的描述无法提供更多他与这些中国助手合作的工作细节,但似乎有这样一种可能:亨克尽管得到了明明学社铅印本,但到底要翻译书中的哪些内容,事先经过了中国助手的筛选和过滤,中文底本卷首与卷末的十余篇序跋,没有一篇被《王阳明哲学》没有收入,假使亨克认真读过这些序跋中的任何一篇,都会明白施邦曜和中文底本的关系,而不致将施邦曜称为“施四明”,更不会认为“施四明”只是卷一的《传习录一》编者。

注释:

1(2)David S. Nivison:Review,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64,84(4),pp.436~442、pp.440

2 关于亨克生平的记述,主要参考了 James H. Tufts 为《王阳明哲学》所撰序,Henke 的《译者序》,以及崔玉军《陈荣捷与中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3~64 页。

3 施邦曜生平参见张岱《石匱书后集列传》卷二十《甲申死难列传》(《明代传记资料丛刊》明文书局 1991 年,第 194~195 页);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六十五本传,黄嗣艾编《南雷学案》卷四《先正·忠介施四明先生》(正中书局 1947 年版,第 151~153 页)。

4 中华书局于 2008 年出版了王晓昕、赵平略点校本《阳明先生集要》,本文简称“点校本”,该书卷首《前言》介绍了《阳明先生集要》版本情况(第 17 页),但对施邦曜生平和崇祯本成书经过介绍过于简略,且有错误,如称“施邦曜字四明,号忠愍”(第 17 页),实当为作“字尔韬,号四明,谥忠愍”。

5 汀漳道驻漳州,据《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志五·分巡道》记载。

6 《阳明先生集要·附录》《王立準跋一》,王晓昕、赵平略点校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023 页。

7 《石匱书后集列传》云:“升屯田司郎中。丁卯,出为漳州知府,升本省布政司参政、四川按察司使,戊寅,擢南光禄寺少卿。”(第 194 页)《明史》本传称:“迁屯田郎中,稍迁漳州知府……迁福建副使、左参政,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今考《阳明先生集要》王命璿序:“幸我四明施公抚漳,前后十年于兹,以荣擢,将之蜀。”(点校本《阳明先生集要附录》第 1014 页)施氏自天启七年(1627 年)开始在福建任职十年,于崇祯十年升任四川按察使,十一年即召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在四川和南京两个职务之间再回任福建布政使的时间应该极短,甚至可能没正式到任就改为南京光禄寺少卿了。

8 刘原道编：《阳明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43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36 页。按：此谱实为施邦曜编，刘原道识，详见本文下一条注释。

9 《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第 43 册影印了李贽、施邦曜、刘原道三种《阳明先生年谱》，实则施、刘两谱乃是一谱，所谓刘原道谱较施邦曜增加了俞璘所藏王阳明像和俞氏识语、刘原道识语，谱后增加了刘原道识语。《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影印刘原道谱版本信息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铅印本。”显然是从 1906 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铅印本《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影印而来。

10 张廷枚所谓五部崇祯本指：张氏家藏残本、陆续购得的“三缺本”，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3 年)购得之善本，见《张廷枚序》，点校本第 1022 页。

11 据王立準《跋二》，该书的刻印“肇工于甲戌之秋，以乙亥夏杪报竣”，此间施邦曜反复修改刻板的个别字句(第 1025 页)。

12 孙锵：《王阳明先生传习录集评序》(民国三年初版)，收入钱明编校《(新编本)王阳明全集》第六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212~2213 页。

13 方硕辅(1854—?)，字芭南，河南禹县人，生平见张宪文、方庆秋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第 477 页)，方文昌《方硕辅与民国初年河南的减漕运动》，王卫红主编《禹州文史》第 22 辑，禹州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2012 年 12 月版，第 113~116 页。

14 刘原道(1865—1938)，生平见巢湖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巢湖市志》第三十二章第二节《人物传》，黄山书社 1992 年版，第 920~921 页。

15 但笔者未见制造局本原书，此处只是推测。

16 中国国家图书馆微缩文献阅览室藏有 1907 年初版明明学社《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存第二册、第三册；该馆古籍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有明明学社 1911 年三版全四册。

17 (19) (20) (24) (27) (29) (30) Henke: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London: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916, pp. xi、pp. Xiv、pp. 47、pp. Xiv、pp. 215、pp. 201、pp. xiv.

18 乾隆本系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孤山馆舍所藏普通古籍，著录为：“《阳明先生集要三编》，十五卷，附年谱一卷”，索书号普 814.6/1032.2/2/c1c2。

19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孤山馆舍藏黔南本著录为“《阳明先生集要文章编》、四卷”，索书号普 814.6/1032.2/c1c2 实则年谱和理学、经济、文章三编俱全，共十六卷，刊刻时间误记为光绪五年(1879 年)，实应为 1897 年。贵州省图书馆藏黔南本情况，参见王晓昕《阳明先生集要黔南重刊本述略》，《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1 期。

20 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21 “望平街”之“望”字，原书模糊难以辨认，据张泽贤著《民国出版标记大观续集(精装本)》“时中书局”条补，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14 页。

22 (28) 施邦曜：《阳明先生集要》，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46、144 页。

23 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十八、教育部对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调查一览表（金陵大学部分）》，载《金陵大学史料集》，时间为 1926 年 5 月 13 日，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 页。